

紀念胡適先生一一〇歲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胡適與現代中國的理想追尋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 授權出版

潘光哲 主編



胡適與現代中國的理想追尋

——紀念胡適先生 120 歲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授權出版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

主 編 / 潘光哲

責任編輯 / 廖煥甄

圖文排版 / 曾馨儀

封面設計 / 陳佩蓉

發行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76 巷 65 號 1 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09 號 1 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 114 內湖區舊宗路 2 段 121 巷 19 號（紅螞蟻資訊大樓）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2013 年 8 月 BOD 一版

定價：520 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2013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胡適與現代中國的理想追尋：紀念胡適先生 120 歲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潘光哲主編.-- 一版.-- 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 2013. 08

面；公分.-- (文學視界；AC0022)

BOD 版

ISBN 978-986-326-148-3(平裝)

1. 胡適 2. 學術思想 3. 文集

112.807

102013369

目次

序	3
導論	5

〔 胡適的人際世界 〕

當胡適遇到蔣介石：論自由主義的挫折	汪榮祖	24
乘桴浮於海：論 1949 年胡適的抉擇	陳三井	50
徐復觀與胡適	黎漢基	74

〔 胡適與現代學術思想的建構 〕

胡適詮釋杜威的自由主義

——以新發現的杜威在中國演講殘稿為案例	江勇振	102
溯源與開展：再探自由主義者胡適的初期禪學史研究問題	江燦騰	127
名同實異：胡適的「整理國故」與大陸當代「國學熱」比較	雷頤	174

〔 胡適與理想政治社會秩序的追求 〕

關於胡適國家政治體制思想的考察

——為紀念適之先生誕生 120 周年而作	萬昌華	195
新生活的觀念及實現：		
以五四時期胡適及《新生活》雜誌為討論中心	陸發春	227
胡適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回應（1949-1952）	潘光哲	243

〔 胡適與自由主義傳統 〕

胡適光焰不熄	周質平	262
中國自由主義者的分歧：1930 年代的胡適和羅隆基	水羽信男	270
冷戰時期胡適的反共自由主義路線的形成（1941-53）	吳炳守	282

〔 胡適與台灣 〕

胡適晚年在台灣	陳儀深	315
一位「保守的自由主義者」：胡適與《文星》雜誌	黃克武	332

〔 附錄 〕

淺論胡適的自由思想	呂實強	360
-----------------	-----	-----

紀念胡適先生一一〇歲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胡適與現代中國的理想追尋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

授權出版

潘光哲 主編

序

中央研究院前院長胡適先生集學者、思想家、政論家、外交家等多重身分於一身，他對中國現代學術的建立，以及自由民主與人權的堅持闡揚，尤為後世傳頌不已；胡適先生的生命旅程與思想遺產，在二十世紀世界歷史脈絡中，有其獨特的貢獻與深遠的影響。2011年12月17日為胡適先生120歲誕辰紀念日，為紀念胡故院長120歲誕辰，海峽兩岸曾舉辦了兩次學術會議。第一次是2011年4月中旬，由北京社科院近史所耿雲志先生主持的胡適研究會、南京大學民國史研究中心，以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單位聯合籌辦，在南京大學舉行。該次會議後來由北京的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了《紀念胡適先生誕辰12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專輯》（2012），留下歷史見證。

該次研討會的籌辦頗為曲折，主要是因為中國大陸雖舉辦過多次有關胡適的研討會，然不曾以慶祝胡適先生誕辰的名義開過會。因此籌辦單位最後仍決定不提誕辰一事，而以「胡適的學術與思想」作為會議名稱。據云這是因為大陸高層仍覺得胡適先生不是一位適合為慶祝其誕辰而召開會議的歷史人物。有趣的是當天開幕致辭之時，多位領導都因故未能出席。由此可以顯示中國大陸在面對胡適之歷史議題時所呈現的尷尬場面：一方面隨著「改革開放的環境」，大陸對胡適的評價已有由負到正的改變，肯定他在白話文推廣、教育與學術獨立、個性追求、自由民主之信仰等方面的看法，另一方面仍有些人覺得不宜公開慶祝其誕辰。

這種疑慮其實從五〇年代「批胡」運動開始就一直存在，當時曾以舉國之力，來清算其思想，改革開放之後方漸改觀。其中較重要的一個轉變是2003年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胡適全集》，此書為胡適研究推進一大步，也為重新認識胡適帶來契機。不過很可惜的是該套「全集」卻刪除了大量胡適的政論文字與反共言論。該社曾允諾要出版一個內部刊行之補遺，然一直未能問世。這樣一來，胡適可謂評估大陸改革開放之尺度的一個指標（這是耿雲志先生的話）。我想我們要等到大陸能坦率、真誠地面對胡適之時，方能認定改革開放已開始從經濟走向政治。

為了彌補大陸力圖掩蓋胡適全貌的缺憾，台灣（與海外其他地方）學界一直希望能「還原一個真實的胡適」。在這方面中研院近史所胡適紀念館曾做過許多努力，最近又擬訂了一系列的出版計畫，希望能彌補此一缺陷。其中最近將出版者包括《胡適政論集》、《胡適與蔣介石史料長編》等。再者，中央研究院更計畫於五年之內與聯經出版公司合作，出版一個更全的《胡適全集》。

相較於在南京舉辦的想要慶祝、又不能慶祝的「胡適的學術與思想」研討會，中研院近史所於 2011 年 12 月 16、17 二日，舉辦了「胡適與自由主義：紀念胡適先生 120 歲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的參與者除了有全世界各地的胡適研究專家之外，胡適先生長媳曾淑昭女士亦專程從美國返台與會。這一本論文集經過兩年左右的醞釀、審查、修改等過程，集結為《胡適與近代中國的理想追尋》一書。本書藉著各學者專家寬廣的研究視野，從政治、思想、文化等層面探討胡適先生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之發展的多重影響和貢獻、反省此一過程之成就與限制，並思索其現實意涵。此書使胡適先生象徵的意義及其思想遺產，得以更進一步發揚光大。我們期待，經由本書的出版與胡適紀念館及學界友人所做的各種努力，能打破大陸學術與思想禁忌，而平心靜氣地思索胡適與近代中國歷史命運的各種議題。

黃克武 2013.3.16

導 論^{*}

潘光哲^{**}

緣起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正逢胡適先生（以下敬稱省略）一百二十歲誕辰紀念，翌年（2012）則為胡適逝世五十周年紀念。瞻前顧往，胡適的生命旅程與思想世界，在二十世紀中國／台灣的歷史脈絡裡都有獨特的貢獻；與胡適相關的思想理論遺產，無論成敗得失，更是我們可以汲取無盡的「思想資源」。為了紀念與闡揚胡適象徵的意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於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六至十七日，召開了「胡適與自由主義：紀念胡適先生 120 歲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由胡適紀念館負責具體工作，邀請海內外學者專家同議共論，期以寬廣的研究視野，回顧闡釋胡適畢生追尋的理想、價值和意蘊，冀望讓胡適始終誠守堅持的信念，經過批判繼承，創造轉化，生生不息，既是鼓勵我們願意邁步前行的永恆動力，也開啟我們得以薪火相傳的理想視域。

本書主要由參與會議之學者的論文構成，並歷經三位專家提出審查意見，送請作者修改後定稿等既存學術體制之程序，方始付梓問世。作者與編者謹懷敬虔之心，期待以自己的學思所得，做為一抹馨香，追念一代宗師留給我們的豐富精神遺產。

^{*} 本文部分內容，增補刪易自拙稿：〈「重新估定一切價值」——「胡適研究」前景的一些反思〉，《文史哲學報》，期 56（台北：2002 年 5 月），謹此說明。

^{**}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評判的態度」

「譽滿天下，謗亦隨之」。胡適在二十世紀中國／台灣的歷史舞台上刻鏤的多重軌跡，本來總有訴說不完的故事。只是，就中國而言，一九五〇年代在中國共產黨政權主導下，大張旗鼓地以九大主題來開展「胡適思想批判」，胡適做為千夫所指的靶子，歷經清算和批判，胡適在中國，竟然是從人們的歷史記憶裡被掃地出門的人物，處於需要自冰封已久的記憶倉庫裡逐漸解凍而被「重新發現」的局面。至於在胡適歸骨埋骸的台灣，胡適這個名字即便不是絕對的禁忌，關於他的生命旅程的整體圖象，在黨國威權體制的壓迫下，則無奈地被有意塗抹，難見青天。像是胡適在一九二〇年代末期至一九三〇年代初期發表了大量批判國民黨訓政體制及其領袖（特別是蔣介石）的文字，也曾經是歷史研究的禁忌。海峽兩岸對於胡適的認識與理解，都面臨著現實政治的壓制。

所幸，大江總是向東奔流的。到了廿一世紀的今天，胡適獨特的生命／思想旅程，在海峽兩岸終於不再是重重謎霧籠罩的歷史命題了。各式各樣關於胡適的著述，層出不窮，五彩斑斕，在在成為我們瞭解胡適的知識基礎。遺憾的是，許多「胡適研究」的成果，未必能夠衝破特定意識形態的網羅，往往呈顯出一幅被扭曲地詭異之至的「胡適形象」。好比說，在一九三〇年代日本步步進逼的困局裡，胡適與友朋創辦《獨立評論》，企望「言論報國」。可是，這群友朋之間，往往意見並不一致，爭論不休¹。如何理解與詮釋這分刊物的言論立場和主張，值得細思深究²。但若將這分刊物的言論立場解釋為「完全是國民黨當局的統治思想，暗合蔣介石政府的大政方針，而失去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本身所具有的獨立意識」，又說胡適在台灣淒涼歲月裡的行為，「在一系列重大原則問題上，唯蔣家父子之命是從，見蔣家父子臉色行事，甚至有時公開扯去了蒙著的『自由主義』

¹ 參見：張忠棟，〈在動亂中堅持民主〉，收入：氏著，《胡適五論》（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頁167。

² 例如，陳儀深分析《獨立評論》裡討論中日關係的文章，更進一步地顯示其間展現的「自由民族主義」（liberal nationalism）的理論涵義，參見：陳儀深，〈自由民族主義之一例——論《獨立評論》對中日關係的處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32（台北：1999年12月），頁261-289。

的面紗，明目張膽地與蔣介石站在一起」³，這種意識形態的表態論說，很難不引起讀者的反感。同樣的，如果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史的地圖上為胡適進行定位工作，視之為「西化思潮」的代表人物，特別是與同胡適立場有相當差異的其他思想流派的知識分子進行對比，以凸顯胡適思想的特殊意涵，固可自成一說；但若將胡適支持蔣介石的政治抉擇，視為「蔣介石獨裁統治的裝飾品」⁴，恐怕也只會提供經過意識形態污染後的歷史智慧⁵。諸如此類把胡適描寫為「蔣氏家臣」，將之列為墮落為既存政權首腦的「文化御林軍」的知識分子成員之一的「史筆」，除了履踐某種「意識形態再生產」的功能之外，還有些什麼別的意義嗎？

在意識形態的障礙之外，由於胡適留下豐富難盡的史料資產，更讓後來的研究者絕對能夠依據現實需要，藉著「胡適之酒杯，澆個人之塊壘」，將關於胡適方方面面的研究與闡述，轉化為對現實政治社會文化思想處境的「戰鬥元素」，為胡適想望的「啟蒙」的未竟之業而招魂。好比「胡適思想」這面旗號，就是殷海光在一九五〇年代打擊國民黨官方意識形態時一用再用的工具⁶。這種與時代脈搏同繫共結的「胡適研究」⁷，對認識和

³ 分見：沈衛威，《學思與學潮：胡適傳》（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頁248-249、頁382-383。

⁴ 例如：鄭大華，《梁漱溟與胡適——文化保守主義與西化思潮的比較》（北京：中華書局，1994），頁318-323；鄭大華在述說梁漱溟與胡適對西方民主制度的認識與實踐的脈絡裡，提出了這樣的論斷。

⁵ 例如，同樣是將胡適與張君勱進行對比的論說，那種痛斥胡適「以美國豪門之心為心」，詬詈張君勱「文化在口，利祿在心」的著作（見：夏康農，《論胡適與張君勱》〔上海：新知書店，1948〕），其學術／思想價值，自然不能和嘗試從「知識分子的坎坷遭遇與悲涼心態」的角度進行「同情的理解」的論作相提並論（例如：雷頤，〈殊途同歸：胡適與張君勱的歷史命運〉，收入：氏著，《雷頤自選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頁172-184）；當然，夏康農的《論胡適與張君勱》問世於1940年代末期的內戰烽火之下，自有其濃烈的文化／政治意義，不能從純粹學術的角度理解。

⁶ 黎漢基，〈殷海光與胡適〉，收入：王元化（主編），《學術集林》，卷9（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頁220-223；殷海光在肯定和維護胡適之外，對胡適思想並不照單全收，兩人也有筆墨官司，參見：張忠棟，〈胡適與殷海光——兩代自由主義者思想風格的異同〉，《文史哲學報》，期37（台北：1989年12月），頁123-172。

⁷ 這種與現實互動的「胡適研究」，或許可以成為撰寫某種意識形態的「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的基本素材，正如同「五四」做為某種歷史意識的象徵符號，顯現出多元而複雜的啟蒙歷史圖景（參見：顧昕，《中國啟蒙的歷史圖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2〕）；至於「概念史」的成果和取向，主要是德國學界的創

理解胡適，自然會形成了先入為主的障礙。同樣的，基於自己的視角，叩問胡適豐富多彩的生命與學思歷程，企圖藉助整理胡適的「思想遺產」，進而「述往思來」，或許可以讓研究者自己得到獨特鮮明的生命和思想體驗⁸；即如胡適自身透過《戴東原的哲學》⁹，非僅闡明了自己的智識主義道德觀與人生觀，還試圖整理出中國智識主義的哲學傳統¹⁰。只是，這等「但取一端，不及其餘」的學術事業，往往有取巧之嫌，難免「見樹不見林」¹¹，更冒著可能把複雜的歷史圖像給「簡單化」的危險¹²。想要對於胡

獲，筆者關於這方面的認識得益於：Melvin Richter,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cept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當然，本文並無意在這一方面開展。

⁸ 例如，吳方表明，可以透過對胡適的瞭解，「試看中國現代史上是否有一條被漠視的現代知識分子文化精神的軌跡」，見：吳方，〈胡適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文化精神的探求〉，收入：劉青峰（編），《胡適與現代中國文化轉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頁241-254。

⁹ 胡適，《戴東原的哲學》，《胡適作品集》，冊32（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6）；按，本書完稿於1925年8月13日，原刊：《國學季刊》，卷2期1（1925年12月），1927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單行本（參見：李維龍〔編〕，《胡適著譯繫年目錄》〔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頁76）。

¹⁰ 周昌龍，〈戴東原哲學與胡適的智識主義〉，收入：氏著，《新思潮與傳統》（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5），頁43-99；另可參看：周昌龍，《超越西潮：胡適與中國傳統》（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1）。

¹¹ 例如，在1928年流亡日本之後的郭沫若，向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歷史和文獻方面進軍，這樣的思想轉折，費人疑猜。史家遼耀東與余英時都認為，郭沫若之轉治古史最重要的動機之一是要打倒胡適，參見：遼耀東，〈郭沫若古史研究的心路歷程〉，收入：氏著，《史學危機的呼聲》（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頁149-170、遼耀東，〈郭沫若吻了胡適之後〉，收入：氏著，《胡適與當代史學家》（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頁141-158、余英時，〈莫道人間總不知——談郭沫若的古史研究〉，收入：氏著，《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頁103-123。筆者則認為，「中國社會史論戰」以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為引爆核心之一，而這場意涵深刻的思想鬥爭，並不是單憑郭沫若個人一心與胡適力爭短長而動搖筆桿之後就能帶來的，應該從《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問世之際的社會背景與其象徵的社會意義進行理解，見：潘光哲，〈郭沫若治古史的現實意涵〉，《二十一世紀》，期29（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5年6月），頁84-90。

¹² 即如浦江清聲言王國維對胡適的影響，但僅出以泛泛之論：「故凡先生【王國維——引者按】有所言，胡氏【胡適——引者按】莫不應之」，並沒有舉出具體的事例（見：浦江清，〈論王靜安先生之自沉〉，原刊：《大公報·文學副刊》〔1928年6月11日〕，收入：浦漢明〔編〕，《浦江清文史雜文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7〕，頁9）；相形之下，後繼學人的論證，則甚為精密，參考：陳以愛，〈胡適對王國維“古史新證”的回應〉，《歷史研究》，2008年期6（北京：2008年12月），頁105-123。

適個人的具體生命存在，對於胡適自身的複雜思想構成是在什麼樣的歷史脈絡下出現的，得到更為細緻精密的認識，類似「弱水三千，單取一瓢飲」的學術工作，未必有所助益¹³。這樣說來，當年面對此起彼湧的「新思潮」的時候，胡適主張以來重新估定它們的價值和意義¹⁴；這種「評判的態度」在「胡適研究」的領域裡，其實也一體適用。

本書收錄的論著，都是這等態度的具體呈顯。即使就現實關懷為基點而回望胡適，各篇佳構的作者仍可懷持「評判的態度」，不願人云亦云，企望就胡適生命思想的脈絡，提出自己的詮解。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周質平教授本即為「胡適研究」領域的先行者之一，他整理編輯的相關史料與相關研究¹⁵，早即嘉惠學林。周教授的〈胡適光焰不熄〉一文，雖然推崇胡適是「為中華民族的進步與尊榮，做出過劃時代貢獻的人物」，論斷「封閉與獨裁是滋生胡適思想最肥沃的土壤，也是胡適思想始終不過時最好的保證」，他的譽贊，仍以史實為本。像周教授特別指出，安徽教育出版社在出版的四十四卷本《胡適全集》（2003年），好似堂皇寶帙，卻刻意地刪削了胡適的「反共」著作，若諸〈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1947年）、〈陳獨秀的最後見解序言〉（1949年）、〈史達林雄圖下的中國〉

¹³ 例如，胡適自早先「疑古」的心態泥淖裡掙脫，他發表於1934年的〈說儒〉，就是具體的里程碑，這篇文章更引發學界相當的爭論，歸根究底，胡適的轉變，乃是傅斯年的「功勞」；參見：王汎森，〈傅斯年對胡適文史觀點的影響〉，《漢學研究》，卷14期1（台北：1996年6月），頁177-193；王汎森從現藏於台北中研院史語所的「傅斯年檔案」裡找到了胡適向傅斯年致意的親筆短簡，並結合傅斯年的作品〈周東封與殷遺民〉，清楚地論證，〈說儒〉的撰成甚受傅斯年的啟發；至於胡適〈說儒〉的相關研究，可參考：鄧廣銘，〈胡著〈說儒〉與郭著〈駁說儒〉平議〉，收入：劉青峰（編），《胡適與現代中國文化轉型》，頁387-395〔他並未言及傅斯年對胡適〈說儒〉的啟示〕。

¹⁴ 胡適，〈新思潮的意義〉，《胡適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1），卷四，頁152-153。

¹⁵ 不完全舉例，如：周質平（主編），《胡適早年文存》（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周質平（主編），《胡適英文文存》（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周質平（編譯），《不思量自難忘：胡適給韋蓮司的信》（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9）、周質平（主編），《胡適未刊英文遺稿》（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周質平，《胡適與魯迅》（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8）、周質平，《胡適叢論》（台北：三民書局，1992）、周質平，《胡適與韋蓮司：深情五十年》（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周質平，《胡適的情緣與晚境》（合肥：黃山書社，2008）、周質平，《光焰不熄：胡適思想與現代中國》（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China in Stalin’s Grand Strategy”；1950 年）等等名篇，在這套《胡適全集》裡「都不見蹤影」。周教授認為，胡適對「反共」的思考，是他晚年的「新境界」，因此，《胡適全集》少了反共的文字，就像胡適〈自由主義是什麼〉所說的：「《長板坡》裏沒有趙子龍，《空城計》裏沒有諸葛亮」一樣。從胡適著作的當代命運為例，即可想見，胡適的言論在此際的中國仍有「切中時弊」的意義。周教授的感受，發人深思。山東泰山學院歷史系萬昌華教授的〈關於胡適國家政治體制思想的考察〉，也是有感而發的論作，他認為胡適關於「憲政主義國家政治體制」的思考，對當下中國的憲政體制建設來說，實有直接的指導與啟迪意義。萬教授大體仍依歷史過程的脈絡，而展示自己的關心所在，如他分析胡適關於國家政治體制思想的成因，即嘗指出，胡適對「美國憲政體制的親身感受與全面正確瞭解」，是他一以貫之堅持憲政主義的思想根源¹⁶。再如，當下在中國甚囂塵上的「國學熱」，居然得以利用胡適往昔倡言的「整理國故」做為自我證成的依據，令人匪夷所思。來自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雷頤教授便析論，兩者乃是「名同實異」，胡適提倡「整理國故」的主旨是想為現代「科學」在中國「尋根」，證明中國並非自外於世界普世價值；當代中國的「國學熱」卻以強調、證明中國文明、文化的「特殊性」為鵠的，是用以拒絕、批判「普適價值」的重要元素。

胡適的政治／社會思想與活動，多樣難盡，紛爭時起，往往構築為理解詮釋的意識形態障礙。如何祛除這等弊失，懷持「評判的態度」，盡量避免以「事後之明」將錯綜複雜的歷史「簡單化」、「標籤化」，自是不二法門。像是胡適在一九二二年與丁文江等友朋創辦《努力週報》，並聯名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既展現懷持自由主義立場的知識人群體對當時政治局勢的判斷反思，也反映他們對於理想政治秩序的想像，嘗試推動政治改革的實踐方式。〈我們的政治主張〉雖然頓即引發了多重的迴響，這

¹⁶ 筆者也認為，胡適自 1910 年前往美國留學以來，羈旅此邦前後 7 年，他親歷目睹美國民主體制運作的諸般實際，體會領略積累的「民主經驗」（democratic experience），成為他始終堅持與闡揚民主的「思想資源」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他宣講民主而不輟的典範例證。參見：潘光哲，〈青年胡適的「民主經驗」〉，收入：錢永祥（主編），《普遍與特殊的辯證：政治思想的探掘》（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2），頁 151-194。

等言論主張，仿若「眾矢之的」，被「群起而攻」¹⁷。懷持自由主義立場的知識人群體固有彼此通力合作之時；只是，勢隨時轉，我們最好不要將這群知識人視為「鐵板一塊」，曾經攜手合力論政抑或相親論學的知識人，往往會因著現實的變遷，立場異趨別途，彼此扞格，終而「分道揚鑣」。在一九二〇年代末期曾經和胡適共以《新月》為陣地，批判國民黨黨國體制而不已的胡適和羅隆基¹⁸，面對「兩廣事變」（1936 年 6 月）的態度，卻如「南轅北轍」，彼此決裂。來自廣島大學的水羽信男教授，向即為日本學界研究中國自由主義群體之中堅¹⁹，他的〈中國自由主義者的分歧：1930 年代的胡適和羅隆基〉，即引用梁實秋創辦的《自由評論》與由羅隆基主持筆政的《益世報》上的意見，釐清相關場景，並指陳胡、羅之間的思想分歧，歸根到底「是在自由與平等這一點上」。

胡適面對「兩廣事變」，贊成由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府「用全力戡定叛亂」，立場清楚可見；如何就胡適與蔣介石雙方互動往來歷史的整體脈絡，開展思考認知，猶待史界同仁共同戮力。台灣史界的資深前輩：汪榮祖與陳三井兩位教授的論著，即可謂是研討胡、蔣關係史而可啟人深思的力作²⁰。汪榮祖教授〈當胡適遇到蔣介石：論自由主義的挫折〉一文綜論胡、蔣關係的歷史故實，尤可細讀史料，依據胡適的日記紀錄他在蔣介石和宋美齡的盛大婚禮上見到吳稚暉一語，從而特別指出，即使胡適「顯然以名人的身份受邀觀禮，未必與蔣已經相識」，兩人的首次相遇，應該就是在這個場合。汪教授明白指出，為了追求民主自由的胡適，既是「沒

¹⁷ 參見：潘光哲，〈〈我們的政治主張〉及其紛爭：1920 年代中國「論述社群」交涉互競的個案研究〉，收入：李金銓（主編），《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頁 147-188。

¹⁸ 參考：劉志強，《中國現代人權論戰：羅隆基人權理論構建》（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¹⁹ 例如：水羽信男，《中国近代のリベラリズム》（東京：東方書店，2007）、水羽信男，〈リベラリズムとナショナリズム〉，飯島涉、久保亨、村田雄二郎（編），《グローバル化と中国》，《シリーズ 20 世紀中国史》，3（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9），頁 103-122；餘例不詳舉。

²⁰ 相較之下，陳紅民對胡、蔣關係史的研究，主要集中於 1949 年以後的情況，也比較仰仗《蔣介石日記》的紀錄，參見：陳紅民、段智峰，〈相異何其大——台灣時代蔣介石與胡適對彼此間交往的記錄〉，《近代史研究》，2011 年期 2（北京：2011 年 3 月），頁 18-33、〈台灣時期蔣介石與胡適關係補正〉，《近代史研究》，2011 年期 5（北京：2011 年 9 月），頁 144-148。

有選擇在書齋裡建構自由主義，也沒有全力從教育培養民主的下一代，而選擇了與當政者建立關係，因而進入了蔣介石的圈子，其目的無非想從體制內改變威權體制」。然而，胡適的努力，完全「未能『軟化』蔣之威權體制」；蔣介石「在表面上非常禮遇胡，想能為其所用……私底下對胡適恨之入骨」。在汪教授看來，「自由主義者不可能與獨裁之虎謀皮，道不同豈能相謀哉」，確為的論。陳三井教授〈乘桴浮於海：論 1949 年胡適的抉擇〉固然關注胡適面對一九四九年的歷史大變局所作的抉擇，也從胡適與國、共兩黨（及其領袖）之間「愛憎離合的複雜過程」，進行考察，特別是他分別整理了胡適對孫中山、蔣介石與毛澤東的看法與彼此關係，駁繁就約，堪稱筆法明快之作。陳教授清楚顯示了，當時的知識人「面臨史無前例的痛苦抉擇」的時候，「淒苦難決」，沉吟思量，「無不摻雜了個人情感、家庭因素、師生情誼、承諾與職責等考量，甚至與經濟問題密切相關，更不排除個體對大我的責任和使命感，極其錯綜複雜，並非單一因素所能闡釋清楚」，胡適也不例外。

如果能從胡適自己思想世界的脈絡來理解他的抉擇，也能深化我們對相關歷史場景的認知。來自大韓民國的吳炳守教授，與筆者的關懷所在，共持同調，都一樣注意胡適關於「反共」的思考述說，或可為此一課題，提供不同的認識角度。吳炳守教授的〈冷戰時期胡適的反共自由主義路線的形成（1941-53）〉一文，從胡適的思想體驗來闡明中國自由主義被「反共化」的思想脈絡，特別注意到胡適「反共主義的美國起源」，像是胡適那篇廣被徵引的〈民主與極權的衝突〉²¹，徵引伊司曼（Max Eastman）的「極權主義」理論，便特別考索了伊司曼的背景，也注意到擔任駐美大使的胡適當時在美國「日常所接觸的反共氛圍」，正提醒我們應該注意胡適倡言「反共」的思想資源。筆者的〈胡適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回應（1949-1952）〉，探討胡適如何解釋探討處在「鐵幕」之下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處境，期可瞭解如何在意識形態衝突之間做出自我選擇和解釋，並企圖

²¹ Hu Shih, "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 (Delivered July 8, 1941),"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218 (November 1941), pp. 26-36, 收入：周質平（主編），《胡適英文文存》，冊 2，頁 885-896；漢譯見：胡適，〈民主與極權的衝突〉，《自由中國》，卷 1 期 1（台北：1949 年 1 月），頁 5-8；本文另有其他漢譯本，不詳述。